

## 無為之用——關於梁家麟文中的 趙紫宸先生及其他

張賢勇

瑞士巴塞爾大學

Theologische Fakultät, Universität Basel

Nadelberg 10, CH-4051

Basel, Switzerland

兩年多以前，筆者在一篇書評中寫道：「五十年代三自運動與歷史傳統間的關係，其實比我們所能想象的，更要錯綜複雜些，單一視角未必能睹盡芳菲。關於三自運動風起萍末、『吹皺一春水』時的消息和景緻，筆者另有文章探討，這篇書評中暫可不論。」<sup>1</sup>這裡所說「另有文章探討」，並非虛晃一槍，文章初稿尚存篋底。<sup>2</sup>此文長期未能定稿發表，除了筆者學業緊張、無暇顧及外，手邊資料不夠、證據還欠完備乃

<sup>1</sup>張賢勇：〈說『不！』的勇氣——評邢福增、梁家麟著：《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建道學刊》第6期（1996年7月），頁212。

<sup>2</sup>此篇1996年初春所起的文稿，題為〈水深與火熱——趙紫宸先生在1950年〉，聯繫當年群眾運動的火熱，探討趙先生如何遵行「把船開到水深之處」（路五4）的教訓，在新環境中繼續事奉上帝的教會。1996年初秋，筆者返歐途中路經香港，在建道神學院訪問時，蒙家麟、福增兩位的邀請，到長洲島一家小食屋飲茶，席間筆者談到打算寫完這篇文稿的事。此前，在1994年夏，筆者還擬過一個提綱，題為〈漢語神學發展的若干條件——關於趙紫宸先生1950年一些文字的思考〉，稿件原來是打算給《道風》的。

主要原因。今讀梁家麟博士論趙紫宸先生的新作，<sup>3</sup>覺得同我的陳年舊稿，頗有可以互相發明處，因此決定不復作等待他日資料齊備之想，但遵前賢有幾分資料說幾分話的老規矩，從舊稿中抽出部分內容，整理成目前這篇對梁文的回應。年來奔波各地，忍饑耐渴，或摩挲塵封的檔案，或摘錄風化的舊刊，雖云識小，彌足自珍。今從收集到的史料中，挑出五件與本文論題關係較密者，附於文末，一以徵信，二為便利各地學者，三亦可告慰「不被人放在眼裡」的前人。<sup>4</sup>

由於家麟兄文中已有「狗尾續貂」（頁70）的話，筆者就萬不敢再自謙，自比「鼠尾續狗」之類，因為那是直將作者的自謙認作自戕的自供狀了。幸好國際學術界遠非《鏡花緣》中的君子國，來虛文俗套者，不是被看成假謙讓，就是視為真諷刺。筆者何必討這個沒趣？本文以回應的方式，順次序簡略地討論梁文中提及但未探討的幾個重要問題。希望家麟兄以及其他讀者朋友批評、指教。

## 一、趙紫宸與吳耀宗的關係

梁文基本上將趙、吳看作思想對立的兩個人物，有句斷語說得乾脆：「他們因誤會而短暫走在一起，因了解而彼此分裂。」（頁91）這是很主觀而且過於簡單化的說法，作者未為這一結論提供任何論據。筆者不否認，趙吳之間，神學思想上容有不一致的地方，至少在1950年前後，論到基督教的革新，趙紫宸先生的文章表明，他是希望以基督教會為主體來流心革面，而吳耀宗先生則比較強調擺脫體制性教會機構傳統的保守勢力的掣肘，來展開基督教革新的大旗。<sup>5</sup>

<sup>3</sup> 梁家麟：〈無能者的無能——1949至1951年的趙紫宸〉，《建道學刊》第9期（1998年1月），頁69～101。筆者於下文述及此文時，只在文中夾注，不另出腳注，以省篇幅及讀者目力。

<sup>4</sup> 這五件都是英文信函，藏於IMC檔案中。在中國大陸治史者，尤易興「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嘆。葛劍雄因而有〈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讀書》（1994年7月號），頁130～141；〈世界上不止有中文〉，《讀書》（1994年11月號），頁101～106之作。

<sup>5</sup> 在近年所讀研究趙先生的文字中，筆者自覺是較早指出三自運動初起時他情感世界中呈現波瀾的跡象。參見筆者於1994年元旦前後定稿的〈站在陰陽的分水嶺上——趙紫宸先生救贖論思想管窺〉注釋五（此文改題後刊於《道風》復刊號〔1994年春〕）以及

至於兩人對共產主義以及中國共產黨人的認識，正如梁文指出的那樣，也是有區別的，但這種區別主要體現在認識轉變以及同中國共產黨人打交道的遲早，而並不意味著兩人在基督教信仰與共產主義之間作出了不同的抉擇。此外，還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兩人時常過從的朋友圈子不同，這也影響到兩人對共產主義接納的迅緩。第二，兩人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時所處的生活環境不同，也決定了他們在對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上有差異。據筆者的觀察，趙先生早年在燕京的同事中，同劉廷芳（1892-1947）博士過從甚密，七七事變後，劉博士因身體等方面的原因，從燕京乃至中國教會舞台上淡出，最終客死他鄉，這對趙先生來說，在友誼上應是不小的損失；當然在學術上，徐寶謙先生的不幸去世，也是令人相當傷感的。此後在燕京校園，與趙先生相知較深的國人中，除了早年的同學陸志韋（1894-1970）先生，大概只有洪煊蓮（業）先生等兩三人而已。這幾位思想上的傾向，是受通常所說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他們都頗得司徒雷登的器重，也就很能說明問題——雖然其間又有分別，比如，劉信奉三民主義似最篤，英姿勃發，頗有儒家濟世情懷；<sup>6</sup>陸則寄情於心理學與文學之間，後雖被推上校長位置，仍是「維持會長」無可無不可的宏達，等到院校合併，調入中科院語言所，也不見他有甚麼牢騷，這也就難怪呂叔湘先生八十年代初仍不忘給他出版早年的英文稿《中國詩五講》，張中行老人九十年代中在回憶錄裡還要留下對他的點滴印象；<sup>7</sup>洪先生游刃於史學，然不能忘情於現實中的教會政治，捲入既深，要在解放後的政治洗澡中洗刷乾淨也難。這幾位在三、四十年代，大概都不會服膺共產主義。

1994年秋定稿的〈大音希聲——評林著趙紫宸傳兼論華人神學史研究的前景〉（次年一月刊於《中國神學研究期刊》第18期）第四節。兩年前，國內有位治中國基督教史的前輩，來德國開會時，也對筆者說過「趙紫宸的心理是很黑暗的」這斷語；聞此，當然不妨見仁見智。

<sup>6</sup> 他早年用英文寫過一本很有意思的書，批評美國史地教科書對中國的「妖魔化」或視若無睹。Timothy Tingfang Lew, *China in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s: A Problem of Education i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Worldwide Brotherhood* (Peking: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Peking Express Press, 1923)。可惜，國內研究中美關係史的學者，大多未及注意。

<sup>7</sup> 詳見張中行：《流年碎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一書。

吳先生早年參加唯愛社，抗戰中隨國民政府去了大後方，不僅與「紅色傳教士」文幼章交往密切，與中國共產黨人也時有接觸。抗戰後，他在反內戰、要民主的運動中，聲名更著。像他這樣一位基督徒，在現實中發現唯愛此路不通因而轉向是可能的，但是要他真正信服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則成功的概率很小。<sup>8</sup> 與趙先生等在淪陷區苦苦撐持，盼望日寇被國軍逐出境外、青天白日再現文化古都的心情和處境不同，吳先生在抗戰期間耳聞目睹了重慶政府統治的黑暗、腐敗以及民不聊生，既然遙望長安不見佳，何妨嚮往延安民主家。無視這種生活處境的不同，硬要四十年代末大陸政權易手之際的基督徒統一認識，這種做法本身，在本質上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原理的。丁光訓主教在紀念趙紫宸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趙先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解放前是，解放後仍舊是。」「趙先生並不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一位一般意義下的愛國主義者。」<sup>9</sup> 可是，對於那些對愛國也要作階級分析的人來說，解放後愛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是理所當然，而解放前愛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就是匪夷所思，老賬新賬一起算，解放後應該用比解放前多百倍的熱情去愛國才對，否則你在政治上就有虧欠；趙紫宸先生大概主張愛國不分先後，所以沒有倚輕倚重，結果自然要被控訴。

當然，這裡談趙吳兩人的關係，話不宜扯遠。梁文未能提供兩人關係因誤會攜手、理解分道的證據，抱歉得很，筆者也提供不了，除非筆者會捏造。筆者能補充的，倒是關於兩人在「舊中國」的友誼以及某些思想共同點的一些材料。<sup>10</sup> 家麟兄對謝扶雅先生不生疏，大概那方面的材料，筆者也不必再引。這裡另舉兩個例子。四十年代後期，吳高梓牧

<sup>8</sup> 其實這一點，家麟兄自己應該也很清楚，參見氏著：〈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建道學刊》第6期（1996年7月），注24。

<sup>9</sup> 丁光訓：〈更多的信任，更大的寬容——趙紫宸誕辰一百周年有感〉，《金陵神學文選》（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1992），頁245～247（頁246）。

<sup>10</sup> 大陸同工中作過趙吳比較的只有幾位。沈德溶先生的名篇自不待言；金陵的關保平老師，著有“Theology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 *Chinese Theological Review* 11:2 (1997), 112-24, 可以參看。

師同吳耀宗先生有過一次英文通信，主要內容是商量通過美國友人，與耶魯大學的賴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教授取得聯繫，申請一筆錢，資助賴德烈名著《基督教在華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1929) 的漢譯，寫信者顯然希望收信人將此信轉交有關方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提到譯者陳增輝先生乃燕大宗學院研究生畢業，頗受趙先生的器重云云。<sup>11</sup> 據筆者看，二吳在上海灘教會圈周旋已久，提到趙，從常情推論，自然是因其名望，卻也表明當年趙吳（耀宗）間私交確實不錯，而且這當也為不少人所知；<sup>12</sup> 否則，一貫謹慎的寫信人這樣寫，就是格外的冒昧。或許今天在世的前輩中，還有人比較詳細地了解趙吳交往始末，筆者願聞其詳，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第二個例子稍微複雜一點，得詳細引述一下。1949年10月26日美國的《基督教世紀》刊登的讀者來信中，有一篇被編者加上〈論趙與吳〉的標題，其中第一段譯文如下：

先生：我抗議貴刊9月28日發表題為〈教會應當接納中國的新秩序嗎？〉的社論。趙紫宸博士先前寫道，「宣教士仍然很需要。選派並資助宣教士的關鍵，取決於派遣他們來的宣教會是否愛主勝過愛他們自己的理論或名聲，」把他同吳耀宗胡亂歸為同類，對他是很不公平的，因為吳耀宗寫的是，「外國差會代表的是帝國主義的宗教班子 (foreign missions represent the religious outreach of imperialism) ……所以，中國的基督教必須同……資本主義及其旁枝——基督教差會——一刀兩斷。」<sup>13</sup>

這位讀者接著指出，感到需要在人民心目中將基督教與資本主義劃清界線的，並不只有中國的基督教領袖，因為在世界教會聯合會成立的

<sup>11</sup> 信函見IMC Archives (國際宣教協會檔案) 中265022號卷宗。

<sup>12</sup> 這點家麟兄大概也承認，見其〈無能者的無能〉，注25；參見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建道學刊》第7期（1997年1月），頁164及注118，119所引。

<sup>13</sup> Ralph M. Galt, "Regarding Chao and Wu," *The Christian Century* (October 26, 1949), 1267, 提到的社論 "Shall the Church Adopt China's New Ord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September 28, 1949), 1124-25。信中所引趙的話，見T.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最後一段，見*The Christian Century* (September 14, 1949), 1608。

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原擬發表反對資本主義的遠為強硬的決議，後因兩位美國代表的激烈反對而作罷，而這兩位代表——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和塔夫特 (C.P. Taft)——自身同資本主義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繫。投書者最後指出，畢范宇 (Frank W. Price) 是當今最偉大的宣教士之一，深受成千上萬中國人的尊敬，但假如他長期以來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支持國民黨政府，那麼從基督教先知性的角度來看，畢范宇就是一位更加了不起的人物。假如幾年前，世界基督教和畢范宇對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作了更具先知性的論斷，那麼今天，中國基督教領袖幾乎沒有必要再使用如此強烈激進的言詞，來對不幸的歷史矯枉過正。

此信表明，作者同情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他寫信時，人民共和國大概剛宣告成立不久），對資本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則持批判態度。他對中國基督教內部情況也頗熟悉，能夠見出趙吳的同中之異。筆者稱此例比較複雜，因為：第一，這是一位身在美國的讀者的回應，所見之異未必大過實際之同；其次，投書之先，已有社論側重趙吳兩人之同，社論撰寫者自然也是對中國基督教發展狀況比較知情的人。基於這兩方面考慮，我們似不便輕易說，這是趙吳思想早就對立的例證。退一步說，若我們承認，趙吳之間的思想距離之大，連有些外國人都已經知道，那麼如何解釋兩人後來會因誤會而結合，就成為更大的難題；這樣，按照梁文的思路，要自圓其說，就得兜售下面的「三文治」：趙吳因了解而彼此對立，因誤會而短暫走在一起，因恢復了解而彼此分裂。只是筆者很懷疑，是否有人會買這個賬。

總之，在趙吳關係上，筆者不主張將兩人完全對立起來，將他們看成是基督教內部兩條路線鬥爭的代表人物。若將趙紫宸先生的悲劇，看作他與吳耀宗先生之間個人的恩怨以及他受吳先生所代表的路線排擠、

打擊的結果，<sup>14</sup> 筆者覺得，就更像無稽之談，連隱射史學的史學影子都沒沾邊。

## 二、協進會從有為到無為

梁文提到了協進會的淡出，是在協進會第十四屆年會會議之後，因「政府扶植吳氏所發動的奪權運動，終於成功。」（頁88）可是同樣遺憾的，是這個結論也未見論證。這裡筆者作補正之前，先從舊稿中完整摘錄一段：

### 權力與是非

《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一書確實有一些特點，<sup>15</sup> 例如，此書一反大陸同類著述諱莫如深的積習，將運動中權力之爭的事實，充分而入微地展示在讀者面前，（參見頁 23~32，41~43，45~48，120~121；179 等處）這是值得慶幸的。但是，也應看到，運動中不同力量的較量，不僅僅是個人的權力之爭，還牽涉到對是非的認識與表態。

邢增福博士在其研究中寫道，1949年至1950年間，「呈現出一幅政府、協進會與吳耀宗複雜互動的畫圖。」<sup>16</sup> 這幅再現的關係圖，低估了政府的作用，同時誇大了吳耀宗個人的作用。照筆者看來，當時政府像 UNMOVED MOVER（何謂全權或全能或極權社會？這正是其象徵之一），撼山易，撼它難。撇開中共幹部的監控不說，當時主張革新的基督教界人士中，似確實有種三者互動關係在。這三者與其說是個人，不如說是派別，或許可以

---

<sup>14</sup> 梁文有注斷言，趙先生一篇論基督教學生運動文章，其中批評：「設若不是針對（或部分針對）青年會，及青年會激進的幹事代表吳耀宗，則我只能說趙氏是在無的放矢了。」（頁78，注25）家麟兄萬沒想到，他以為可證明趙吳思想有重大分歧的例子，實是張冠李戴（詳見下文）。同樣，梁文注77中的推論，也建立在虛假的前提上，屬無稽——沒有實證——之談。家麟兄稱，趙作為頭面人物之所以被打倒，「我們可以確定這必然是跟吳耀宗有關的。筆者相信，趙紫宸在教會改革的看法，與吳耀宗乃至中共中央所擬訂的路線方針有嚴重分歧：基於趙氏在教會界的名望，這些分歧構成對吳耀宗的教會改造運動的嚴重障礙，因而非以政治力量把他打倒不可。」（頁97）這就恐怕不止是《三國演義》，而跡近《封神演義》了吧？

<sup>15</sup> 參張賢勇：〈說「不！」的勇氣〉，頁212。

<sup>16</sup> 邢增福、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頁120。

三者各自的主要喉舌——刊物作代表，分稱協進派、天風派和恩友（團契）派。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命名，其理據有二：一是派別的能量遠大於個人，二是即便個人可以同時在不同的刊物發表演論或在不同的機構兼職（如吳耀宗與協進會的關係就極為夾纏不清），三派的整體傾向仍是卓然可辨。關於這三派力量之對比及消長，應是一篇專論的題目，希望今後有人繼續探索。

單說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對於她在抗戰後直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為止這段時間內的功過，也有深入探討的必要。將之簡單視為參與或抵制「三自陰謀」的一個機構，在史家為失職。從本書勾勒的有關史實，大體可知政府對協進會的態度前後有不小的變化。政府開始並沒想完全撇開協進會，而是希望通過「摻砂子」的辦法，逐步將之改造成能夠上通下達的「行政機構」，否則不會同意讓協進會發起全國基督教會議。1950年4月吳耀宗等組成的基督教訪問團到京，才傳出原定八月在京舉行的全國會議延期消息。局面此後始形複雜，先是十九人與周恩來談話，繼而是革新宣言的草擬及徵求簽名並發表。與此同時，協進派自找台階，宣稱將不定期推遲因而已名存實亡的全國會議併入十月協進會年會中。對此，天風派直截了當報導全國會議「議決停開」，幸災樂禍，喜形於色；恩友團契派則「再退一步希望」，失望之情，溢於言表。

是次年會中，天風派與協進派進行了決戰性的較量。有「華東局的積極領導」，並由政府硬性干預，不讓任何「外國傳教士出席」，穩操勝券的天風派贏得既不光榮，也不輕鬆，因為如吳耀宗所說，「帝國主義的傳教士雖然不在裡面，他們的影響，卻還是頑強地在那個年會中表現出來。」<sup>17</sup>《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也指出，會後「協進會舊有領導不得不放棄以原有班子主導教會革新的期望，轉而擁護得到政府支持的吳耀宗的革新運動。」（頁48）應澄清的有兩點：一是會後即是算帳的秋後，二是會後天風派更無意打協進會的旗幟，所謂此後革新運動「名正言順地在全國協進會的名義下推動了」云云，彷彿霧中看花。關於第二點，除去天風派的主觀原因，還有兩個客觀上原因：首先是協進會的結構，決定了她不能受某個人的隨意支配；其次，當時國外宣教部的津貼還是多多益善的。所以即使是政府，大概也是既不希望又不可能立即將不順眼的協進會人馬全換掉，或者另起爐灶取而代之。

<sup>17</sup> 吳耀宗：〈中國基督教的新生〉，《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93），頁25。



後因韓戰，美方凍結中方財產，中國政府倉促招架間，遂有把「經濟仗」當「政治仗」來打的「北京會議」。此會是三自運動的轉折點：一是政治色彩加濃；二是其控訴大會，將對敵和政治鬥爭的手段搬入基督教運動，造成至今不可彌補的傷害；三是三自籌委會的成立，預示協進會使命告終。此後，控訴中首當其衝的協進派不用說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日見衰落。而三自籌委會開始名正言順地領導運動，並著手策劃數月前被迫停開（不是併入協進會年會）的全國會議，到1954年第一屆基督教全國會議召開，中國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協進會就漸成歷史陳蹟了。

關於協進會在五十年代初三自運動發起時的作用與地位，當然不是一篇札記就可以充分剖析清楚的。第一屆基督教全國會議之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協進會起碼在形式上仍然維持著，1956年有外國朋友到上海訪問，就在協進會會見了吳高梓牧師和其他幾位工作人員。需要說明的是，舊稿中所謂「摻砂子」，是指當時工會代表強行列席協進會高層會議，中央文件中所說「華東局的積極領導」，也當與這一系列的動作有關。而三份刊物，後來也起了變化，最明顯的是1950年10月協進會第十四屆年會後，《協進月刊》編輯人員開始更動，到次年年中《協進》新一卷第一號轉世時，該刊已成為控訴協進會老班人馬的新喉舌。

要透徹研究協進會從有為到無為，除了從中共的干預角度審視，也得聯繫協進會以及國外差會的應變措施來考察。關於這點，控訴運動中揭發出的有些材料，並非空穴來風，從筆者所詳細閱讀過的當時協進會中外主要負責同工寄到海外的有關報告和私人函件中，能夠得到部分印證。當年為了重新起用吳高梓，西教士在背後有不少的考慮，私下也作了相當的交易。後來出乎西教士意料的，是吳高梓牧師自己泥菩薩過了河——自身得保，協進會中的西差會同工並沒能成功地和平過渡，主要原因當然是局勢的發展迅猛異常，「形勢比人強」；吳牧師的覺悟，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

談到「三自」運動的興起以及協進會的淡出，還有一點常被有意無意地忽視，即與此同時基督教一些小派開始登上新中國的歷史舞台。有人把聚會處、耶穌家庭等小派描繪成一開始就受政府和「三自」的逼迫；此舉若不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就是對歷史的有意歪曲。當年的報刊，

還不算稀少，真相也不難發現。比如，在倪柝聲案發之前，聚會處的弟兄姊妹可說是積極擁護「三自」革新的一支主力軍。今天回顧起來，這些小派也是被充分利用過的，他們的「使用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本色化」的基督教群體，把炭火堆在形形色色由西差會扶持建立的宗派頭上；二是作為往昔受主流教會壓制、排斥的信徒群眾，向昔日的「壓迫者」示威，衝擊主流教會一統天下的協進會組織。「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挑動群眾鬥群眾者，往往是得利漁翁；被挑動鬥人者，同時也就注定成為被鬥者。在協進會感到形勢失控之日，正是「三自」革新領導小組受命危難之際，出來收拾「金甌一片」之時。但是，利用小派也帶來了至今難癒的後遺症和併發症。<sup>18</sup>

### 三、趙紫宸與西教士

趙紫宸與西方宣教士的關係，今天也得重新清理。這裡先簡單提出三點來討論。首先是他對西教士和外國朋友的基本估價。趙紫宸先生甚至在 1950 年寫文章時，還坦誠地說，他生平結識了不少外國人士，特別是英美友人，包括老師和同事，但是他們中間沒有哪個人要他不去愛自己的國家，「教士中間不少真心愛人的男女；他們真感動人，也真叫人愛他們。因為愛他們，也就對於他們的國家與人民發生了好感。」這在他看來，「原是人情之常」，另一方面，「西宣教師藉著帝國主義勢力，作威作福的事少，中國教徒仗勢欺人，瞞著西教士去作惡的成分多。教會裡的中國牧師教友都自動地仰承西宣教師的鼻息，造成了買辦的作風。這一大半是中國人的不好。」<sup>19</sup>所以在反帝名義掩護下的排外聲甚囂塵上之時，他不盲目、不附和，保持清醒的頭腦，實在是不容易。值得注意的是，趙先生並沒有認為西教士十全十美，相反，他對他們也有嚴厲的批評，但這些批評基本上是就事論事，不作引申誇大；同時他認為中國教會裡的不少醜惡現象，與其說根源在西教士，不如說在一些奴顏媚

<sup>18</sup> 關於這點，筆者另有文章〈雅努斯的雙面〉（近期將在德國發表）專門探討，這裡恕不涉及。

<sup>19</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用愛心建立團契》（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1995）頁16。

骨的國人。所以，把西教士同帝國主義分子畫上等號，在他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其次，我們就要研究為甚麼這樣一個人，也會在控訴運動中上台亮相。兩年多以前，筆者去洛桑訪問趙紫宸先生的瑞士友人、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同事王克私 (Philippe de Vargas, 1888-1956) 教授的子女時，看到王教授生前特意保存的一份剪報，是《大公報》1951年12月12日有關〈燕大宗學院師生控訴美國文化侵略〉的報道，此會同年11月24日舉行，「出席這次控訴會的有基督教抗美援朝委員會、北京基督教聯合會、天津衛理公會的同道和燕京大學工會、學生會、婦女會代表及學生等。」會議開了一整天，「始終在嚴肅、悲憤的氣氛中進行。」關於趙紫宸先生的發言，有如下的敘述：

趙紫宸院長第一位走上台控訴。他首先說：「我今天站在這裡控訴司徒雷登，因為我認清了美國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司徒雷登是美國的高等特務，是反蘇反共反我中國人民的反動分子，也就是中國人民的死敵。他是糖面的毒藥，是棉花裡的刺刀。他在中國代表美國對於中國所謂之『傳統的友誼』籠絡中國人，誘惑中國人，通過宗教與教育來散佈親美崇美的毒素。」

他繼續又從司徒雷登的宗教思想、道德觀念與政治主張三方面來控訴他、揭露他在表面上彬彬有禮，而實際上卻在背後露出鄙視中國人的態度；表面上道貌岸然，而要起手段來卻老奸巨滑，叫人不能測度他的淵深。而且利用宗教作為他的政治資本，在明處暗處散佈反動宣傳。

趙紫宸院長氣憤的指出：「司徒雷登是美國出色的特務。他利用宗教作為文化侵略的工具，奴化中國的知識分子，麻痺我們青年的思想。他利用我們的宗教學院，也利用了我。」趙院長接著沈著地說：「我已經是一個老年人；但是我相信一個老年人如果能夠下決心，一定可以徹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不甘心自暴自棄。我雖不能像快馬那樣奔跑，但是要像駱駝那樣一步一步地走上革新。」<sup>20</sup>

<sup>20</sup> 接著上台依次控訴的，還有方貽予教授、楊儒懷同學、程紫明校友、蔡詠春教授、黃秀英教授和院總務主任張秀，最後是蔣翼振副院長為控訴大會作初步的總結。從這個架勢，我們不難看出控訴會真實的矛頭所向。雖然趙先生半年多以前，就在《恩友》、《協

「文革」以後，大陸不少人都悟出寫檢討的祕訣，其實是與舊時做八股的章法一脈相通的，雖然一般人都沒有作過制藝。我們今天看當年這份控訴會的報道，已能發現後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逐步發展完善起來的批判八股的某些端倪。近些年來，海外已有人專門研究大陸幾十年來暴力語言的使用，可是檢討以及自我批判在文體學上的意義，似乎還沒有人深入探討過。上面所引趙先生的控訴，在記者已經是提煉出的精華了，但在筆者看來，仍然過於輕飄飄，在音調鏗鏘的政治時髦用語的背後，沒有任何哪怕一件具體的事例，可以定被控訴人的罪，除非在思想上欲加之罪。趙先生第一段話，巧妙使用循環論證法，看似避輕就重，實乃避實就虛。第二段話，似乎到了具體論證的階段，仍然是使用「土遁法」，從官樣文章中一筆蕩開，讓記者先生水中撈月，同時為包括自己在內的燕大舊同事提供了一把邏輯保護傘。最後的話，表面上看，是自我解嘲，其實也是對那些激進的「積極分子」的反彈和諷喻。讀者諸君切莫以為這只是筆者異想天開的解讀，其實在五十年代，海外那些控訴對象中，已有不少人捉摸出了這個道理；而那些不理解的，則往往將這種「反噬」看作巨大政治壓力下人格扭曲的表現。

第三，他與外國人士的個人交往。趙紫宸先生是位很重情誼的人，或許是因為性情有別、身分不同，他與外國同事間的關係，顯然就比手下的同事許地山先生要和睦得多；許對司徒雷登不滿，很大程度上屬於因個人感受導致的恩怨，許與王克私的交情應該說不薄，但是與趙紫宸相比，知己的成分要少得多。後來，公開宣布的趙先生的罪狀中，就有「甘願與敵為友」的話，而例舉的是「與帝國主義分子何明華、樊都生、畢范宇勾勾搭搭：與美帝分子范天祥組『前途設計委員會』，進行活動」。<sup>21</sup> 照此標準衡量，西方人士（宣教士以及學者、教育家等）中，

進》等刊物上控訴過司徒雷登及世界教會協進會，但對他及其器重的門生來說，燕京的這場控訴大會才是短兵相接，是真正難過苦關頭的開始，後來事態發展證明了這點。方和蔡黃夫婦，都是北平解放後，在趙先生再三敦促下從美國回來的（參見本文附件一以及古愛華博士趙紫宸研究專著中所引趙紫宸1948年11月26日致蔡、方的信），被迫上台自打耳光，究竟作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趙先生早已意識到形勢的嚴峻，見該報道中引述他的最後一段話。

<sup>21</sup> 原見《協進》（1952年6月號），轉引自〈無能者的無能〉，頁97。此期刊受海外

大概確實沒有幾個，可以逃出帝國主義分子這張天羅地網，所謂的「對華友好人士」不過都是假面而已。曾幾何時，在我們摘下所戴的有色眼鏡時，才發現別人往往沒有假面。

雖然我負人，人何曾負我？改革開放後，大陸教會領袖出訪，提到教會在中國依然存在的奇蹟時，一般都不會忘記感謝海外的主內弟兄姊妹，因他們用禱告托住了基督在中國的羊群。可惜，趙紫宸先生沒能活到再次出國訪問的時候，到了國外，他會有甚麼樣的感受，我們也就不得而知。但是，北平解放後，他的處境還沒惡化時，就有不少國外友人在惦念、關心著他，前面所引《基督教世紀》的讀者來信，就是一個例子，而且這不是孤證。同刊1949年9月21日的讀者來信欄，還發表過另外一封讀者來信，此信主要摘引趙紫宸先生一封私函中兩段話，因此編者以「趙博士的來信」為標題發表。此信也很重要，且不知為何同樣為大部分研究趙紫宸這一時期思想的作者所忽視。<sup>22</sup>若無此信，我們就不清楚一週前該刊發表的"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解放半年後的北平〉）之由來，以及同刊半年前發表的"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中國的喜慶時節〉）之背景。弗萊徹 (Fletcher) 提到，收到趙紫宸最近一封來信的當天，他正好同一位想進神學院的美國青年面談，這位青年對基督教護教學與政治科學有無比的興趣，「趙院長的這封信，煥發著務必將道帶入一個新世界、新時代的當代聖保羅的精神，為這樣的學生以及我們大家提供了嚴肅思考的養料。」接著，他就摘錄了趙紫宸來信的部分內容，現將趙先生信件의 片斷，漢譯如下：

我希望美國人民理解，對中國的態度應徹底改變。中國共產黨人同封建主義、西方帝國主義、權勢者的資本主義進行殊死搏鬥，確實在解放人民。他們這樣做，已贏得了幾乎所有痛恨反動派的腐敗和壓迫的中國人的支持。美國的大棒政策，一向支持匪幫，已全然破產了，而其結果，必將導致太

的密切注意，參見本文附件之五。

<sup>22</sup> 比較下列著作：古愛華 (Dr. Winfried Glüer) 所著 *Christliche Theologie in China: T.C. Chao 1918-1956*（《中國的基督教神學：趙紫宸1918-1956》）、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1）、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以及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紫宸的教會改革觀〉，《建道學刊》第7期（1997年1月）。

平洋兩岸兩個大國間的傳統友誼毀於一旦。我真誠希望，美國不要再縱情於夢想，將極為放肆兇殘的一小撮獨裁者，繼續打扮成反對共產主義的、維護臆想中自由的衛士，以此迫使中國在其野心面前低頭就範。沒有哪個民族，可以按自己的心願，來重塑全世界。我真誠希望，美國能夠找到方法和途徑，來同即將成立的中國新政府繼續其外交關係。冷靜而現實的智慧，或許還能保持中國人民尚懷有的友誼，並進而恢復兩國間牢固的紐帶關係。

至於基督教的前途，並非由外在的敵人所能決定，而將取決於其內在的對基督的忠誠與否。<sup>23</sup>

要說趙紫宸與吳耀宗在解放初有何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礎，上面的引文就是很好的例證。三年前，筆者在評林榮洪博士《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4）一書時，已經指出：「從歷史研究來看，重要的是根據現有的史料來分析轉變如何發生，而非將這些史料棄之不顧、一心只從假定去懸揣。林博士認為趙氏態度的改變等，『都跟他對新政權的看法有密切關係。』此論若成立，那麼受外來壓力之猜測就站不住腳；筆者還得補充一點，趙氏對共產黨從沒信心到有信心，恰同他對國民黨從寄多希望到完全失望的過程同步的。筆者常聽到一些老人作見證說，當年他們對共產黨也不了解，可對國民黨倒是太了解了，所以寧願接受共產黨，因為他們想這些共產黨再壞還能壞過國民黨嗎？」<sup>24</sup>

上面所引趙先生的信中，還有一點也值得一提，這就是他對中美關係的展望，不僅與司徒雷登所盼如出一轍，與中共高層最初的設想也相當合拍。可是後來的研究者，受毛澤東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的迷惑，全不考慮當時中美雙方四邊——中國的國共兩黨與美國的鷹鴿兩派——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得出的結論，自然與歷史事實不符。<sup>25</sup>不過，要

<sup>23</sup> Joseph F. Fletcher, "A Letter from Dr. Chao," *The Christian Century* (September 21, 1949), 1107.

<sup>24</sup> 參見張賢勇：〈大音希聲——評林著趙紫宸傳兼論華人神學史研究的前景〉，《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18期（1995年1月）。

<sup>25</sup> 參見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說歷史的進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其中也當包括那些善良的意願，再聯想到一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惡是比善更能推動歷史前進的扛杆的話，就不能不令人長嘆息了。

#### 四、歷史研究中的媚與讒

家麟兄是學歷史出身的，而治史在很多人看來，既枯燥又不易，能潛心於此、樂此不疲者，一般都有特別的恩賜，也往往能夠得到他人的敬重。就這篇談趙的梁文來說，作者史學家的長處，幾乎為寫作者的短處所淹沒。首先我想提一下文中所引張化的一個觀點：

趙紫宸、吳雷川、吳耀宗，先後都接受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學說。他們的神學目標是為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的生存尋找意義，也一直在指出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價值，希冀中國人接受基督，從而讓基督教植根中國；但由於他們接納的社會改革方案來自自己盛行中國的理論，他們只是給這些理論加上基督教的名義……<sup>26</sup>

張化先生筆者似乎也見過一面，那是1993年在上海召開的某次研討會上，印象是此人年輕，思想解放，觀點鮮明，但這裡的論點，卻不能不說是很含混的。這種將共產主義同社會主義相提並論的寫法，出自海外研究歷史的人的手筆，倒也情有可原，但張先生卻是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又是長期對黨的政策和理論研究有素的人，這實在是不應該有的差錯。再說，作為一篇歷史研究性質的論文，其中的史論沒有堅實的史料基礎，難怪要遭到家麟兄的駁斥：這番話「對趙紫宸——特別是四十年代以後的他——全不適用。」

*Ambassad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中有關記載，例如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以後，旬月不去，以及周恩來派昔日燕京的學生王華前來接洽等事。司徒雷登晚年孤寂莫名，他被迫飛離中國時，陰影已經籠罩在他頭上：先是在太平洋上空獲悉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抵美國後受得勢鷹派的轄制，基本上處在一種半軟禁狀態。後來，韓戰爆發，麥卡錫主義盛行，早被認定須為丟失中國負責的這頭替罪羊，自然更沒有張口申辯的權利了。

<sup>26</sup> 張化：〈基督教早期「三自」的歷史考察〉，收入朱維錚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161，這裡從梁家麟：〈無能者的無能〉，頁86，注48轉引。兩年以前，筆者在蘇黎世大學東亞研究所圖書館借閱過此書，寫作此文時，一圖省時，二圖省錢，沒有重新去借閱，但我相信，家麟的引文不至於對張文斷章取義。

筆者對梁文這裡要作的批評，則是：這段話其實對吳耀宗先生也不適合，對吳雷川先生適合與否，可以另當別論。吳耀宗先生，像趙紫宸先生一樣，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學說不假，但他對西方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一是比較直接的，二是比較深入的，與中國社會上一般知識青年的稗販耳食不可同日而語，原因也很簡單，吳先生的外文好，而且會思考。在筆者看來，他是真正信奉基督教的（家麟兄同我的分歧之一也在這裡），而且無須為社會理論「加上基督教的名義」——這種變相的「外衣論」是筆者不能同意張先生論點的另一個理由。從吳先生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出，他所做的，恰恰是努力從基督教的原典——聖經中挖掘出有關社會的革命性的教訓。我們可以不贊同他對聖經的解釋，卻不能說他是用經文詞句去粉飾社會理論。

或許在一些人看來，張化先生文章的用意是好的，表明基督教裡面有不少實實在在的共產主義者，而不是像「左王」們不分青紅皂白，把宗教界看成一片漆黑。筆者同意這種良善的體貼，卻不能不正視此說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對共產黨來說，此說再強調一下，就會離列寧的黨所嚴厲批判過的「黨外布爾什維克」的論調不遠，容易產生不良的影響，腐蝕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鬥志。對基督教會來說，這種來自外界的「美化」（「媚」），每每會起到「醜化」（「譏」）的反作用，使信徒群眾誤以為這些基督教領袖原來不過是一些披著基督教外衣的共產主義者。因此，筆者覺得，在歷史研究中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同時拒斥「媚」和「譏」兩方面的誘惑。筆者讀梁文，就有種感覺，家麟兄對喜愛者常現媚態，對他所鄙薄的人，不管有道理沒道理，不惜譏言相加。

例如，梁文中提到趙紫宸先生對帝國主義的看法問題。家麟兄認為，趙、吳等五人聯名發表「我們參加人民政協的經過」提到的共同思想基礎，只是吳耀宗「個人的期望，因為其中許多地方並不適用在趙紫宸身上，特別是在反美帝國主義一點上，他在此時與政府及吳耀宗等的想法有懸殊的距離。」（頁86）遺憾的，這裡同樣未見任何事實根據。筆者很奇怪，在反對帝國主義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趙居然還會同吳等人有懸殊的距離。多麼希望家麟兄能讓筆者開開眼界，瞄一眼他掌握的如山鐵證啊！可是筆者心裡也很有數，他拿不出這方面的證據，因為看他



的徵引，他了解的，筆者大都知道。這倒不是說，寫文章、做研究，一定要有新材料的發現，可是我們至少當承認，提出新見解新看法，要以現有材料為根據，而不是臆想懸測。陳援庵（垣）先生《通鑿胡注表微》中考證篇序錄有云：「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彼畢生從事考證，以為盡史學之能事者固非；薄視考證以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竊以為，治史者當以此為鑒。

在大陸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的人，一般政治敏感性不由你不增強。對筆者這一代人來說，美帝國主義、美國、美國人民是不容混淆的不同概念，在趙先生文章中，其實也分得相當清楚。梁文提到1951年，在批判美帝國主義的浪潮中，「趙紫宸亦不能免俗，發表文章，反對美帝武裝日本」（頁93），實在對解放初的這些教會老人，缺乏足夠的認識；殊不知對美國及其人民的好感，遠遠抗拒不了對美帝的憎惡，而當年深受日寇蹂躪的國人，不加倍反對美帝重新武裝日本，才真是咄咄怪事。

上面的例子，不過反映出：在對史實作解說時，梁文的隨意性過大。現再舉兩例說明。頁83上稱引趙紫宸文章所說：「中國人民不會完全忘記過去教會在文化、社會更新及歷次政治革命中所作的明顯貢獻」時，梁博士對中國人民加了一個按語：「這個詞的意思是指新政府。」有何根據呢？顯然沒有。這是比較極端傾向於「讒」的例子。這樣就對趙紫宸先生的思想作了莫大曲解，作者把自己的誤解當作指點芸芸眾生的知解，真讓人生嘆道：「你不說我還清楚，你一說我越發糊塗了。」其實，像趙先生這樣的基督教思想家，對新社會的基本政治常識，並不缺乏，我們只需仔細琢磨梁文同頁所引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文中那段話，就可知作者的思想理論素養匪淺，比如他說「神學家接受了天演論的挑戰……建立了一個演進的創世觀。到了今日，中國的神學工作者難道不能進一步，接受共產主義的挑戰而建立社會主義的神學麼？」注意，他這裡所用的是「演進的創世觀」，而不是進化論的世界觀；所問是「社會主義的神學」，而不是共產主義的神學，雖然當時大多數人恐怕還未聽說過「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

這類話，可是後來趙紫宸遭禍時，這後面的設想，也成為羅織他不赦罪名的把柄之一。<sup>27</sup>

第二個詮釋之誤的例子，見於家麟兄對內在論的解說。梁文頁82注釋35和36中提到趙紫宸先生使用的 "Marxian dynamic immanentism" 一語，認為林榮洪博士及福增兄的解釋，均不可取。家麟兄稱，福增兄關於「這顯然不是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或許是指某種不強調鬥爭的馬克思主義」<sup>28</sup>的說法：

未曾捉到趙紫宸的要旨。筆者相信，這個詞的「動力」便是馬克思等所強調的辯證運動，無論是自然抑或歷史的；而所謂「內在論」的意思，則是上帝內貫於人類歷史的進程中。趙紫宸在此主張，基督徒必須參考共產主義的歷史主義觀點，視上帝及他（原文作示字旁——引者）的旨意內貫並昭顯於人類歷史動態且辯證發展的過程中。（頁82，注36）

接著，梁文還引證了吳耀宗先生《大時代中的上帝觀》中的一段話。

筆者從中學到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確實讀過不少，但這裡不必非要去搬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武庫中的兵器來比試一番。在此想說明的只是，趙紫宸先生所謂 "Marxian dynamic immanentism" 固然不妨有多種解釋，但在趙先生肯定不會將原意理解成「上帝內貫於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因為那樣，就將上帝強加給馬克思及其追隨者，也就既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又顯示出自己的無知。這與梁文引證的吳耀宗先生《大時代中的上帝觀》中的論述有所不同，因吳先生在那裡是將基督徒與唯物論者比照起來講的，而且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場來觀照唯物論的。家麟兄在這裡的誤釋，恐怕歸根究柢，還是媚態在作祟吧？

---

<sup>27</sup> 關於解放前後基督教人士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可參見梁家麟：〈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一文的注108及其所引。

<sup>28</sup> 邢福增：〈中國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161。（參見梁家麟：〈無能者的無能〉，頁82，注36。）福增兄這句話後面，有句關鍵性推測：「這反映出趙氏意圖區別馬克思的思想，從而方便基督教與之協調。」筆者想，這樣的結論是可信的。雖然前面家麟兄所引的那句話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用法還嫌突兀。

## 五、青年會與基督教學生運動及其他

筆者在前面注釋14中提到，家麟兄將趙先生一篇論基督教學生運動文章中的批評，認定是針對吳先生的，因為「設若不是針對（或部分針對）青年會，及青年會激進的幹事代表吳耀宗，則我只能說趙氏是在無的放矢了。」（頁78，注25）筆者已指出這是張冠李戴，但原因未曾說明，這裡應該加以交代。

家麟兄這裡所引趙先生文章，大概是福增兄「挖掘」出來的，<sup>29</sup>筆者看，這確實是篇很要緊的文章。家麟兄判斷的理據是對的，即趙先生不會無的放矢，可由此推導出的結論卻是錯的，以為趙先生的矛頭所向，是青年會及其幹事吳耀宗先生。此處導致判斷失誤的原因，是對中國現代基督教運動史上一個重要關目的隔膜。不要說解放以後在香港長大的家麟兄對此歷史常識欠缺，就是今天六十五歲以下的中國大陸基督徒，即使是從小信主的，對這一關目，同樣大多不了然。至於六十五歲或七十歲以上的大陸基督徒，若是當年或者與青年會有關係，或者在基督教學生運動的圈子中呆過，那麼對兩者的分別就比較清楚，不大會犯將兩者混為一談的錯誤。

中國現代基督教運動史上，青年會與基督學生運動間的歷史關係，十分微妙，不僅僅是國內的糾結，也包括國際上的因素，往往不易為局外人察覺。這方面，筆者似乎還沒見過專門研究。當年的過來人，像謝扶雅先生這樣的老成學者逐漸凋零後，詳細知道原委的人，恐怕不是太多了。像羅冠宗先生、丁光訓主教、徐如雷教授，對兩者的糾葛，可能會有些直接間接的知解，但限於年齡和當年的資歷，對一些內幕可能仍有疑點。中年以下的人要了解真相，遇上的困難，相形之下更顯得難以克服。怎麼辦？一般信徒可以完全不理睬這些「勞什子」，研究中國基督教或者教會史的學者呢？筆者想，我們還得正視這種困難。

1987年清明前，筆者南下廣州，專程去拜訪謝扶雅先生，當時九十五高齡的老人從美國回來定居還不很久，卻因一些令他覺得壓抑的事，

<sup>29</sup> 參見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142，注20。

搬出了東山園，到市郊南石頭造紙廠兒子家的宿舍去居住。他考慮到十天中，筆者要多次奔波往返於東山和南石頭之間，建議筆者就近在造紙廠的招待所住下，吃飯可以到他那裡一起吃。在他當廠長的兒子關照下，筆者在床位緊張的招待所所有了一席之地，得以安身，時常去謝老那裡借書還書、提問應答，也吃過好幾頓飯。有一天，氣溫陡降好幾度，他特意遣家人來問，禦寒衣服夠否。還記得在交談中，筆者也因顧子仁或梁小初的話題，向謝老詢問過青年會同基督教學生運動間的關係，他同雙方關係都不淺，當知道不少不足向外人道的情況，可是由於事久年高，謝老所談的並不很多。他談話中有一點給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也覺得很可惜，同他交往的這些友人都不錯，待他也很好，可是這些人常常不能相容。

今天，南窗下、書桌旁，一盞孤燈，兩杯清茶，再聽老人談當年基督教內的事，只能在夢中。但是他的文章、著述仍在，餘生也晚，卻也有幸在閱讀中，繼續隨老人漫步歷史長廊，聆聽他對某些事件、人物的評價。筆者想，有同好者，不妨從《巨流點滴》開始，進而遍讀該書系列中其他有關余日章、梁小初、顧子仁、朱友漁、曾寶蓀等人的傳記，那麼對本世紀前半葉中國基督教的情況，就會有比較具體、形象化的認識，對一些歷史研究必備的常識，也可望略略具備一點。

話說回來，人無完人。筆者想，大家沒人敢說自己的知識結構已經天衣無縫、研究視野中不存在盲點。問題是，按照常情推理，發表研究文章，並非故意要用解剖刀首先解剖自己的；遇有不知，可以繞開，發現盲點，及時躲避，在向讀者和同行奉獻研究心得與成果的時候，當務之急當然不是去糾纏自己知識上的空白。家麟兄此文中的一些漏洞，根由也在其他方面。比如，筆者在前節中提到歷史研究中的「媚」與「讒」，已經舉了些例子。本節所舉青年會同基督教學生運動的例，同樣的材料，在福增兄看過也就罷了，到了家麟兄眼前就不然，他可以從中讀出對吳先生的抨擊來；原因恐怕至少是帶了對吳先生的「讒」色眼鏡吧？否則，誰會想到去追問基督教學生運動與青年會的那筆糊塗賬呢？

說到這裡，筆者想順道談談與本文有關的幾個小問題。在筆者看來，很有意思的是，梁文開頭述及文章緣起時提到「一個較私人的因緣」：

最近剛因兩本有關五十年代三自運動及吳耀宗的著作，被國內三自教會接連為文作政治性的攻擊，心情不免有些異樣。正思如何回應之際，因著備課關係，重讀趙紫宸在建國前後的言論，發覺竟與我在這些年所曾說過的話出奇相似……在惺惺相惜之餘，決定將趙氏的言論更好的整理出來，一方面豁現一代神學家的時代睿智，另一方面也突顯這位學者的時代悲劇，以誌紀念。（頁70～71）

由於家麟兄語焉不詳，一般讀者自然無法猜出「政治性的攻擊」的具體內容，只會覺得教會對人攻擊不好，對學者使用政治性的攻擊更不好。若筆者僅僅讀到這段文字，不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也會很為家麟兄抱屈不已，並更加鄙視「國內三自教會」中那些刀筆吏的。可是，從筆者對家麟兄這方面的了解看，就覺得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他提到的那兩本書以及發表的其他一些文字，筆者大都仔細看過，目前暫時可得出的結論是：家麟兄的作品並不是因為其中具體的學術內容受到國內某些人士的批評，批評者自然也不是站在學術立場上嚴格的歷史學家；批評的焦點，在於他們覺得家麟兄文字中政治性漫畫色彩過濃。據筆者所知，有的批評對家麟兄是張口一個梁教授、閉口一個教授梁，目的自然為了強調他的學術地位，幸虧這些批評者沒把他同建道神學院學術副院長的職位掛起鉤來。

筆者對此的認識是，歷史學者不可能沒有政治傾向，也並非不能談論政治問題，然而在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特別是政治意義重大的結論，必須嚴格按照學術研究的規範辦事，也就是實事求是，有充分的歷史證據，而非根據自己的政治傾向來隨意演繹、潑灑。在這些方面，筆者覺得，家麟兄若能深自省察，當能發現自己確實有過與不及的地方。筆者在〈說「不！」的勇氣〉那篇書評中，也曾委婉批評過他的「才氣橫溢」給他的研究帶來負面影響。當然，這不是說，筆者反對史學家有才氣；相反，對劉知幾以來德、識、才、學兼備的我國史家傳統，筆者一向是敬信受的。事實上，在近代史學大師中，筆者對陳寅恪先生的敬意和仰慕，或許更在對陳垣先生的景仰之上。

因此，筆者看家麟兄之受人批評，不是由於他的才太大，乃是因為他的氣太盛，才、氣失調，論、史脫節。就筆者回應的這篇文章來說，他一本正經使用的有些術語，實在是隨意性很大，史學研究中，這是很不嚴謹的做法，如「教會改造派」（頁71）、「還原主義」（頁71）、「紅色基督徒」（頁99）、「原教旨主義」（頁100）等。特別是「紅色基督徒」的標籤，表明在「後文革時期」，家麟兄的思想還沒有進到「文革已過」階段。想當年，郭沫若的一篇文學政治色彩學，用五種顏色塗抹各色人等，解放後，那些沒有蒙他賜予鮮紅頂戴的一大批作家學者，如沈從文、林同濟，就很難重新抬起頭來。今天中國的政治氛圍當然要寬鬆得多，但是這種政治色彩學，還是不去沾它的邊為好，古人早就明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用紅色標籤封人者，自己很難清白到哪裡。不知家麟兄以為然否？

## 六、世界教會協進會的決議與趙紫宸的辭職

本文第四節提到，研究歷史的人，在旁人眼裡，常會顯得太清苦。但是樂史不疲的人，當也有他的獎賞在，這或許就是發現的喜悅。有過這種經驗的人，包括那些科技人員，大概不會太少。治史者既會時常發現「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也容易覺察「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這類歷史所開的玩笑。我們眼前就有一個難得的例子。

當年趙紫宸先生被宣布的罪名之一，是他「擔任世界反動宗教團體的負責人之一」（頁97所引），這裡的反動宗教團體，明眼人都知道就是世界教會聯合會，<sup>30</sup>因為趙紫宸先生在該會成立的時候，代表「第三世界」的教會（當年稱後進教會）當選為六位會長之一。趙先生解放後榮幸地成為政協代表，除了他滿足周恩來在「關於人民政協代表的幾個問題」中提到的幾個條件，<sup>31</sup>他擔任世界教會聯合會會長的身分，自然也是考慮到的重要因素之一：當時要不是共產黨受蒙蔽，就是吳耀宗先

<sup>30</sup> 即世界教會協進會(WCC)，敘述中一般用今天的譯名，下面趙先生在其中所任，也稱會長而非主席。

<sup>31</sup> 參見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162所引。

生等人受蒙蔽，因為到1950年上半年為止，國內還不見有人提起該會的性質是「反動宗教團體」。

可能會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掌握得很好的人對你解釋說：「第一，事物會起變化的；第二，人的認識有個過程。」這兩點，筆者完全贊同，雖然在分析具體問題時，應用的次序和重點會有所不同，因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國人開始認識到世界教會聯合會的反動性質，是在韓戰爆發、聯合國作出了明確決議，世界教會聯合會隨之作出相應的反對侵略的決議之後。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進入朝鮮半島，就彷彿四十一年後聯合國部隊進入海灣地區幫助科威特收復國土，雖然是美國軍人為主，名義卻無疑是聯合國的，雖然如此，我們也不曾聽見有誰宣布聯合國是「國際反動政治團體」，中國大陸解放後，反而一直謀求「重返」聯合國，為此奮鬥到七十年代初，終於心願得償。在這方面，國人對聯合國，似乎不需要甚麼認識過程，從開頭就認定值得加入。

然而，對世界教會聯合會的認識過程，到九十年代初又因事情發生變化而有所深化，因為在國家政府的支持下，中國大陸的基督教協會代表中國基督教會「重新」加入了世界教會聯合會！這次，不清楚的是，究竟事情是在中國國內發生了變化，還是在世界教會聯合會裡面發生了變化，推測的時候，為保險起見，我們不妨說兩者都起了變化，至少在國內已不再聽見有人質疑：「我們的三自愛國的教會怎麼能加入世界反動宗教團體？」或許是有人想，卻不敢，因為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政府陷入不義了。

如此看來，歷史似乎給我們開了一個國際玩笑。在這個玩笑中，像趙紫宸先生這樣的人物卻吞食了不該吞的苦果。如果我們真相信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那麼我們就不妨怯生生地問一下：「既然您知道事物變化和認識過程兩個法則，趙先生在變化發生前、認識過程還沒終止的時候，擔任了六會長之一，算不算很大的罪名呢？他認識以後辭去了會長職，能不能將功贖罪呢？」可是，如今最大的問題，不是我們沒勇氣問，而是我們不知道該把這個問題問向誰邊。

梁文中關於趙先生的辭職有所說明，只是「被迫高姿態地辭去主席的職司」一語（頁92），顯得含混，同時沒有清楚點明趙先生「7月19日在北京《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我辭去了世界教會協進會主席之職〉的文章」，是在1951年，即世界教會聯合會決議發出一年以後。趙紫宸先生在同國外友人的多次通信中，<sup>32</sup>都談到辭職的原因，敘述方面側重點有所不同，參見文末〈附件三〉。

## 七、趙紫宸先的悲劇性

趙先生的悲劇，實是新中國有思想的正直基督徒悲劇的縮影。筆者仍想先抄一段舊稿：

### 一足與鼎立

五十年代三自運動之興起，一般以〈三自宣言〉的發表為標誌。這宣言，英文常作 *Christian Manifesto*，《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及梁家麟〈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文中多作〈基督教宣言〉；大陸五十年代基督教人士習稱〈三自革新宣言〉，後因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名稱中剔除了革新二字，遂沿稱〈三自宣言〉。其對象是誰？這一基本問題先須澄清，否則探討三自運動起源及目的，終不免南轅北轍。可喜的是，邢福增已注意到這一點：吳耀宗「決定著手起草一份對外的宣言，期望能藉此除掉一般人對基督教的成見。」<sup>33</sup>這裡所謂對外，顯然是針對社會上的非基督徒，特別是針對信奉無神論的各級政府幹部。宣言發起人致全國同道的信，開頭就說：「自解放以後，國內有不少的同道覺得現在還有許多人對基督教不了解，所以我們應當發表一篇對外的宣言，表示基督教在新時代中的立場。」<sup>34</sup>信末則指出：「除了這個對外宣言以外，我們還預備擬定一個對國內基督徒同道的宣言，和一個對國外宣教會及基督徒同道的宣言」<sup>35</sup>可見發起人心目中的宣言是先一後二共有三，但另外兩個宣言，後來卻並無下文。而從《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附件二來看，

<sup>32</sup> 筆者在〈大音希聲〉那篇書評中，曾經提到趙先生1951年4月28日致世界教會協進會某負責人的函件。從那封信中，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趙先生當時的困惑以及矛盾心理。若是泛泛地談，或許可以將之看作愛國與愛教中的一種緊張。

<sup>33</sup> 梁家麟、邢福增：《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頁36。

<sup>34</sup> 羅冠宗主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頁3。

<sup>35</sup> 羅冠宗主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頁4。



當時中共中央「與教會上層談判，使他們發表宣言」，目的本來就十分明確，即「是為了便利我們在教會的下層進行愛國主義教育」。<sup>36</sup> 因此可知宣言起草，發起人與中共幹部之間，起初目的就各不相同。基督教人士以為宣言發表，就同外界求了同；中共幹部何曾一刻忘記過存著異？周恩來此時活像樣板戲裡披著胡彪外衣的楊子榮，在三爺面前如此奚落樂副官：「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結果，在國家機器的輿論攻勢中，原來對革命者說不的勇氣就不大的基督教領袖們，自然願意「捨己」從人，隨著長官的意志，在「求同」的道路上亦步亦趨，唯唯而諾諾，怎敢再自作主張發表原來就一廂情願的另兩個宣言？同時，一旦中共中央自己的目的已達（找個「愛國主義教育」的由頭），宣言一足而已，何須畫蛇添足，鼎足而三！基督教界很認真地「預備擬定」的後兩個宣言，自然胎死腹中，只不知當年簽名者中有沒有人追問過。

因此，我們該承認，關於「三自宣言」的發表及後來三自運動的開展，本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中共中央的觀點。其對待天主教、基督教的基本方針是，不僅「應當不幫助他們的發展，並反對其中帝國主義影響」，還要「廣泛進行唯物主義與科學知識的宣傳，來逐漸縮小宗教的市場」；<sup>37</sup> 白紙黑字，鐵證如山。若說大陸境外基督徒幾十年來對三自運動的主流評價，只是毫無根據的「陰謀論」，<sup>38</sup> 實難以服人。更有趣的是，似乎已抵制「陰謀論」的詮釋者，行文中偶而也會隨著史料的鋪展流露出跡近「陰謀論」看法。<sup>39</sup> 二是宣言發起人的觀點。四十位發起人中，卻並不完全包括與周恩來談話的十九位基督教人士；<sup>40</sup> 四十人中，當時的思想境界當然也不完全相同，日後的分野更是懸殊。然而，作為宣言發起人他們是有一定的共識的。本書明確指出這種「求存」的願望，極有見地；與此相關的，是宣言兩個方面的信息：政治立場的表態和宗教上自我革新的決心。

---

<sup>36</sup> 梁家麟、邢福增：《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頁254。

<sup>37</sup> 梁家麟、邢福增：《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頁247。

<sup>38</sup> 參見梁家麟、邢福增：《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頁3注2、頁122及157注60等處。

<sup>39</sup> 參見梁家麟、邢福增：《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研究》，頁39第一段；頁241。

<sup>40</sup> 名單見羅冠宗主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頁10，研究為何有人未成為宣言發起人，或很有趣。

目的不同的雙方，為何又能一拍即合？外在形勢是大前提，周公政治手腕「高明」和基督教人士在威逼利誘下的「輕信」，亦是促成因素。即使是經過秀才們潤色的周公談話要點，像「諸位在政治上站穩了腳跟，便不會受到歧視，只有這樣才是出路」<sup>41</sup>等語，四十多年之後讀來，仍覺是居高臨下的最後通牒，騰騰殺氣，撲面而來。吳耀宗也承認，與周談話前準備的文件，「本來是請求政府解決基督教的問題的，但它後來卻變成了基督教自己表示態度的文件了。」<sup>42</sup>若說三自運動「源頭不濁」，指宣言起草、發起人的初衷，似大體不錯；當日賈老牧師道出此語時，實際已含譏評，只是引用者習焉不察罷了。

施行愚民政策的前提是自欺。天下人是可以被永遠蒙騙的麼？隻手不能遮天；一指卻能障目。是是而非非，首要的是毋自欺。

趙紫宸先生的悲劇，當在他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會面之時就已注定。他在1950年〈三自宣言〉發表之前撰寫的文章中，早就隱約表明，他對發起「三自」運動的教內教外兩種觀點的調和已經感到絕望。<sup>43</sup>他之所以只能在閃爍其辭中隱約表明，自然同他對形勢的了解有關，這裡我們不妨想一下他的老友張東蓀先生得禍的始末，雖然大部分人至今仍不清楚。身為政協委員，確也有身不由己的苦衷，許多話到了嘴邊還得留三分。對趙紫宸先生這樣的人來說，不能暢所欲言已是十分痛苦的事了，再加上後來要違心地承認誣陷之罪，如世界教會聯合會是反動宗教團體、西方傳教士都是帝國主義分子——注意這裡的「都是」，不是筆者的疏忽，而是五十年代「一網打盡」、不許有漏網之魚思路的注腳——等等，其內心會是甚麼樣的境況？我們不難想像；這裡我們也只能想像。福增兄在他的〈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一文結尾處，曾引用過大陸陳思和先生一段話，大意是說：五十年代以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的結果，是凡能生存下來的人，只能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實行自我閹割的人。<sup>44</sup>陳先生所用「凡是」（凡能……只能）句式，筆者不完全同意，

<sup>41</sup> 羅冠宗主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頁479。

<sup>42</sup> 羅冠宗主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頁17。

<sup>43</sup> 參見本文注5所引討論的趙紫宸先生的文字。

<sup>44</sup> 原見許紀霖、陳思和等著：《道統、學統與政統》，《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匯報出版社，1996），頁57，這裡從邢福增：〈中共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

因為就筆者所接觸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中，不乏保持陽剛之氣的偉男子，了解原中國人民大學許孟雄教授的人，大概都能同意筆者的看法。但是，陳先生所說的，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確實性。至於是否能套用到趙紫宸先生身上，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從我們現在了解的情況來看，趙紫宸先生在五十年代受到打擊以後，並沒有完全消沈下去。本文〈附件三〉就清楚表明，他自有他的感情寄託處，比如寫劇評。當然，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這也是一種逃避，沒有因抗爭而從容就義的烈士那麼壯烈，或者像殉道者那般光榮；但是我們不能要求人人都作張志新、人人效法聖彼得。逃避也是一種抗爭，而且恰是維繫中華文化千年不墜的原因，所謂「藏諸名山，傳之後世」是也。<sup>45</sup>

具體談到趙紫宸先生，筆者看很可以用無為之用加以概括。解放之初，他是滿懷熱情，希望在新中國大有作為的，所以他再三敦促他留美的弟子火速回國效力（參見本文〈附件一〉）。其後，他被迫不能有所作為。在這段被迫無為的時期，他大概悟出無為也可以有積極的意義，此後除非被迫「有為」——例如點名去上台發言，<sup>46</sup>他毋寧說選擇了在教會政治中的無為。總之，在趙紫宸先生的生活處境中，這種無為之用，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含義：（1）用其無為；（2）使其無為且有用；（3）選擇無為：拒絕利用與被利用。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的同情與敬佩，大都不是歸向那些當年一日千里的「駿馬」，而是像趙紫宸先生這樣一步一個腳印的「沙漠之舟」——他自比的駱駝。

---

180，注228轉引。

<sup>45</sup> 小楓兄的《拯救與逍遙》，已受到不少的批評和讚美，無須再來添加一分。不過筆者覺得，逍遙作為一種精神狀態，有比沒有好，這就意味著在大家群起幹革命的時候，也允許他人有不革命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像趙紫宸先生這樣的基督徒，既然早年就已經從逍遙過渡到拯救，為何在解放後的環境中，又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從拯救踱向逍遙？難道說拯救之力還有所不逮？或者說逍遙的魅力大過我們的想象？

<sup>46</sup> 至於梁文和其他學者曾經提及的趙先生再三要求他的兒子一家回國一事，可能原因更為複雜。（參見本文〈附件二〉、〈附件四〉、〈附件五〉）親情是不能忽視的要素，中外通信不便帶來的隔膜也肯定存在，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也是一種「表演」，這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最後談點題外點題的話。梁文的題目，驟看不易領會，讀到文章結尾，筆者才知道他同義反覆的根據，但仍不能確切了解他的意思，就像他有篇文章劈頭來個反詰作題目〈又是我們欠的債嗎？〉一樣，讓人著實摸不著頭腦，所以筆者在〈言情言理〉的副題上就幽了他一默。<sup>47</sup>可能是由於大陸、香港幾十年來中文教學的理念相差太大，生活在「集權」統治下的大陸中小學生，作慣了老師布置的命題作文，一旦自由寫作，寫出來的大半仍是準命題作文，惟恐別人說你離題萬里；而香港學生享受著無量的自由，少拘束，多抒情，哪怕是命題作文，也不妨自說自話、自問自答。不過，梁文題目中的無能，可以另作別解。子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在筆者看來，這或許是中國文化中關於無能的典範釋義，跟隨基督，又願親近孔夫子的國人，可以將這個子曰基督化一下，說成「仁者有望，故不憂；智者有信，故不惑；勇者有愛，故不懼。」而改造過的三句話，似乎都能找到聖經上的根據。關於無能，梁文所引用趙紫宸先生的文章中，倒也有一句很精辟的話，可惜梁博士將之輕輕放過：「不能調和的，我們不必強求調和，必得獨立的，我們應當保存其獨立。假的不因我們的努力而存在，真的必不因我們的無能而消泯。」<sup>48</sup>趙紫宸先生大概可以算出入儒道間的人物，稱他為無能者，似乎過於將他儒家化了。筆者以道家氣十足的用語為本文張目，不過是希望藉此沖和一下，使趙紫宸先生更能以本真面目，示我後人。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附件：

1. 黃秀英、蔡詠春致美國友人函（1950年10月30日）
2. 趙紫宸致馬尼康函（1956年3月20日）
3. 馬尼康所記會見趙紫宸的經過（1956年3月）
4. 莫爾溫致趙景德函（1956年5月22日）
5. 莫爾溫致馬尼康函（1956年6月18日）

<sup>47</sup> 參見梁家麟：〈又是我們欠的債嗎？〉以及張賢勇：〈言情言理——體仿《菜根譚》或 nach Wittgenstein〉，《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頁106~112，212~215。

<sup>48</sup>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金陵神學誌——四十周年紀念特刊》（1951年11月）。參見梁文頁83所引。

## 提要

附件一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蔡春、黃秀英夫婦回國後第一個聖誕節前致美國友人的通函，具體收信人不詳。寫信日期為1950年10月30日，距他們回到北京才兩個多月，距信中提及的「三自宣言」的發表僅月餘（第五段）。寫信人對該宣言的介紹，是審慎而持平的。對燕京大學及其宗教學院近況的報告（第六、七段），則相當樂觀，寫信人特別提到他們回來與趙紫宸博士同工很覺幸福，這與一年以後的他們處境相比，可謂天上人間。兩人所開的課程（第九段）也值得注意。（參看〈無為之用〉第三節及注20）

附件二是趙紫宸先生1956年3月20日致印度信義會馬尼康主教的私函，主要內容是請收信人設法幫忙，讓他的兒子趙景德一家能早日從美國回到祖國。馬尼康當時任職於東亞基督教議會(The East Asia Christian Conference)，該會同世界教會聯合會(WCC)、國際宣教協會(IMC)都有聯繫，他訪華是應吳耀宗先生的邀請，與他同行的有瑞典的倪思同(Gustav Nystrom)。他三月中旬在北京同參加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的基督教領袖有長時間的會晤，並將世界教會聯合會涂扶特(Visser't Hooft)和國際宣教協會冉森(C.W. Ranson)的邀請信分別面交吳耀宗先生和吳高梓牧師，他轉交的還有當時世界學生基督徒同盟緬甸籍總幹事的邀請信。此行中，他還在若干教會領袖的陪同下，拜訪了周恩來總理，周的英姿笑貌以及對聖經與基督教教義的熟識，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訪華結束後，向有關方面提交了詳細的報告（同年5月30日）。（參見〈無為之用〉注46及附件四、五）

附件三是馬尼康主教所記會見趙紫宸先生的經過。其重要價值，在於它是趙先生1952年被「清算」以來國外所能得到有關他近況的最詳細、直接的報告（文幼章夫婦在燕大採訪趙先生時，趙尚在位，參見 *The Canadian for East Newsletter* No. 51〔1952年3月號〕）。報告主要分四部分：趙強烈希望他的兒子和兒媳能早日回國；趙談他近年來的遭遇；趙解釋為何辭去世界教會聯合會會長職；趙目前的工作及生活情況。1956年春，對中國大陸基督徒來說，似乎也是從前此的「懸崖百丈冰」，到「春風楊柳萬千條」的情景轉換。吳耀宗先生在全國三自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報告(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頁68~82。)中提出的三大見證、十項任務，直到近幾年仍被大陸教會的有識之士不斷稱述和緬懷。國際交往方面也有所鬆動，例如，與馬尼康主教同期訪華的，還有應燕京和金陵兩所協和神學院的邀請，前來講學的匈牙利彼得(Janos Peter)主教和捷克赫魯瑪德卡(Josef Hromadka)教授。趙紫宸先生得以單獨邀請國外客人並交談近兩個小時，在這大氣候中才有可能。可惜好景不常，「反右」風暴轉眼就到；大陸基督教重新喘過氣來，已是六十年代初的「神仙會」了。馬尼康報告所記日期

(3月17)，同附件二趙先生信中所記(3月19日)有出入，估計馬尼康因事後追記，失誤的可能性較大，暫且存疑，俟後再考。(參見附件四、五)

附件四是趙紫宸先生的美國友大莫爾溫受馬尼康主教之托，於1956年5月22日寫給趙紫宸先生的兒子趙景德博士的密信。(參見附件二、三、五)

附件五是莫爾溫會晤了趙景德博士之後，將有關情況向馬尼康主教報告的密信。莫爾溫5月22日致趙景德的信(即附件四)發出後、大概在六月初收到回信，並於6月4日將趙景德的回信內容轉寄莫爾溫，這封6月18日的信，是莫爾溫6月15日在華盛頓見過趙景德後，給馬尼康關於趙紫宸先生所托之事的最後答覆。信中稱：趙景德夫婦已取得美國國籍(第一段)；趙景德認為他父親堅持要他回國，是因受到外在壓力，且指出父親近來的信都是副本而不是原件，此事也甚可疑(第二段)；趙景德明確表示留下是自己的選擇，父親可能長期受蒙蔽(第三段)。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接著引用了1952年6月號《協進》有關趙紫宸先生被撤職的息，用以指正馬尼康報告(即附件三)中轉述的不確實處，結論是趙紫宸先生對前幾年遭遇的輕描淡寫，有可能是他記憶失誤所致。

### 附件一

Yenching University  
Peking, China  
October 30, 1950

Dear Friends:

As we think about Christmas we think of you, and are anxious to make sure that this message of greeting reaches you in good time, to reaffirm our common bond in the love of Christ.

We were most grateful for the many letters received since we left Amherst. If you have not received a reply, please take this as a temporary substitute.

We arrived safely in Peking on August 24 after 3 1/2 month's journey. Leaving Amherst, Massachusetts on May 8 we spent 3 weeks crossing the continent. Owing to the kindness and hospitality of friends the trip turned out to be very interesting and educative. We sailed from San Francisco on a Danish freighter, and had a most pleasant voyage over the Pacific. It took us 33 days to get to Hong Kong including 9 days in the Philippines where calling in the ports of Manila, Iloilo, and Cebu we met and visited

hundreds of Chinese friends and relatives. From Hong Kong Yung-ch'un had hoped to visit his mother in Fukien but failed to do so because of the unsettled coastal situation. After five weeks with Hsiu-ying's mother and brother we sailed for Tientsin which is only 2 1/2 hours by train to Peking.

Arriving in China we were impressed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inflation and corruption and the fast restoration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and of general peace and order. People live very simply, but they are nevertheless fed and clothed; wartime misery is gone. What we need most now is peace and a chance to rebuild. Judging from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hort time since Liberation we are certain that if we can only have a few years of peace we can go a long way towards improving the general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eople.

The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 have recently issued a declaration in which they try to make clear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An impression has grown in the past and is at present quite widespread that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have at times made use of the churches in China to further their own interests. Christian leaders wish to make it clear now that this is no longer the case. As positive measures the declaration re-emphasizes the self-government, self-support, and self-propag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goals towards which both churches and missions have been labouring for many year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Christians in China are ungrateful for the debt they owe to the churches in the West. Nor does it mean that the bond of fellowship between them will in any way be weakened: no definitely not. Just as the bond of love between the child and the parents deepens as the child matures in age, so will the bond of love between the younger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older churches in the West deepen as the former grows in independence.

Yenching University campus is as beautiful as ever. Under the excellent leadership of Dr. C.W. Luh, the University is carrying on very well indeed.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the Christian atmosphere here has undergone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Never have we seen the Christians here care so —<sup>49</sup> for the faith they hold. Never have we seen the Christians here stand so closely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In contrast with past experience the University Sunday services and the daily morning chapels are now very well attended. Students have also organized themselves into small groups which meet for daily morning devotions and weekly fellowship activities. What they seek is the Christian faith itself; anything short of the core of religion will not satisfy them. You can imagine what a real home coming we have experienced and how much stimulation and encouragement we are daily being given in such a community.

---

<sup>49</sup> 此處有一詞（約三個字母寬）看不清，姑存疑。據語意，當為 "much" 或其同義詞。

The School of Religion which offers a regular B.D. course is in the best shape ever seen in its history. The enrollment of students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we have ever had, and the spirit of devotion to the Cause of Christ is profound. The students, though a small minority in the University, are exerting an influence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their numbers. During the liberation they were the mainstay of the Christian youth movement throughout China.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they are working extremely hard both taking the lead in the Uni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and participating in other University activities. Through the Christian magazine which they run, En Yu or "the Gracious Friend", their influence is reaching out the Church at large. We are happy to be back here in the School and to be working with Dr. T.C. Chao, our old friend and teacher.

We were very fortunate to arrive with a home already prepared for us at the Friends Center. The latter was started by our friend Miss Burt, a professor in the university who is a memb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in England. Three Chinese families and Miss Burt herself are living together here making an experiment in Christian community living. Meanwhile the place is also serving as a centre for all kinds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It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to us to be living in the Centre where we are strengthened by the sharing of Christian experience.

We both began teaching three weeks after our arrival. Hsiu-ying offers courses i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Personal Counseling. Yung-ch'un teaches a course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and another i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a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 Joan is enjoying her new experiences in the Bridgeman Academy which is a well known Christian High School in Peking. Because of distance she has to be a boarding student, coming home every week-end when she has her meat meals, and her music lesson with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Music. Dorothy goes to the Practice School on the campus. Speaking practically no Chinese when she arrived in Hong Kong her spoken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is now the purest in the family and her Chinese composition was 82 in her monthly report.

With warmest Christmas greetings,

Hsiu-ying and Yung-ch'un Ts'ai



## 附件二

Bishop R.B. Manikam  
Tranquebar House  
Tiruchirappalli, S.I., India

T.C. Chao  
70 Ta Fo Sze Hsi Chieh  
Peking, China  
March 20<sup>th</sup>, 1956

My dear Bishop Manikam,

It was a rare privilege indeed to have had your presence in our home yesterday. Allow me to say how deeply I appreciated your offer to render me assistance in my attempt to get my son Edward and his wife Vera Lin and their three children to return home.

Since I have related already in detail how they have so long been detained in the States, it is only necessary for me as a reminder to mention a few simple facts as follows:

1. Edward C.T. Chao Ph.D., 35 years old, went to the U.S.A. in 1945. He got his doctor's degree in 1947-48 in geology and later on did research work in geological engineering.

2. Vera Lin, Edward's wife, 35 years old, is a B.S. in biology. She went with a daughter of hers to America in the middle of 1947. She and her husband lived in Chicago for some time.

3. The Bureau of Geological Survey of Szechuen extended him an offer to work in that province, and upon Edward's acceptance of the invitation, the Bureau sent him the necessary travelling expenses which reached him in September 1951, too late for him to return freely.

4. Edward made efforts to return, either directly or via Europe, all in vain, since the U.S. government had prohibited Chinese students, especially student of science, to return and offer their service to their fatherland.

5. U.S. propaganda against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ust have poisoned their minds; threats of imprisonment and fine as reported by those who recently came back from U.S. to China must have made them hesitant in taking positive steps toward returning and their lack of direct knowledge of home condition must have made it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them even to express their desire for home-coming.

6. Edward's address is as follows:

Dr. and Mrs. Ed. C.T. Chao  
1524 N. Ohio Street  
Arlington, Virginia, U.S.A.

I have prepared a letter to Edward and Vera in Chinese, telling them the things about which we wrote ever so many times. My hope is that correct and true information may reach them through you. You have come to see and know how freedom and happiness, together with highly rewarding work is waiting for them in their country, and how their parents and brothers are daily agonizing over the unsurmountable<sup>50</sup> difficulties in the way of their returning to China.

You may send the enclosed letter to my son in any way you see fit and may use your knowledge of our real situation here and your influence to dispel the clouds of distort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me.

You may, if you please, request your American friends and others to assist in the matter. Your endeavour will be most deeply appreciated.

Yours gratefully,  
Sd.-T.C. Chao

---

<sup>50</sup> 所見原件如此，當作 "insurmountable"。

## 附件三

Interview with Dr. T.C. Chao on March 17th

Dr. Chao invited me to lunch. I was with him in his house for nearly two hours.

1) Dr. Chao spoke at length and with great emotion regarding his son and daughter-in-law in the States. He says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return to China, though the<sup>51</sup> want to. He has moved his own Government to arrange for their return, but they are powerless. He appeals to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the USA and the influential Christian friends in the States to intercede on his behalf and enable the return of his son and daughter-in-law to China. He has given me a letter, a copy of which I enclose herewith. During the last day of the Peking Conference he made a moving broadcasting appealing to Christians in the world to enable him to get back his son and daughter-in-law in his old age. He is, I believe, 71 and his wife 72.

2) I was fortunate in getting Dr. Chao to speak of his past experiences very freely. Soon after the Communist control of China, he went through a process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of himself. This sort of thing was everywhere in the air. Students and staff of Yen-Ching<sup>52</sup> went through this process. He at first did not believe in it. Therefore he was asked to stay quietly in his house for a few days and introspect himself and write out his own statement. This lasted for a week. However, this has been interpreted and broadcast all over the world as a house-arrest. There was nothing like that at all. He ha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self-criticism is a very good thing and that it prouifies one's soul. Every Christian worker<sup>53</sup> in the world must go through this process for his own benefit, he thinks.

As for his supposed retirement, Dr. Chao was planning to retire anyhow. He was then nearing 65. Every two years the Dean of Yenching is selected. When he was asked to spend a few days quietly in his house, it was his Bishop that wrote to him a letter to that effect, and not the Government or the College. He was never deposed or unfrocked.

The main misunderstanding about him in China arose by what he had written in 1939 against Communism. He had forgotten it, but his students referred to it and brought it up and questioned him on that statement. He had to ransack his own heart and find out if he still adhered to what he had written then. He knows now that he cannot defend that statement of 1939. It is just what those outside China think and

---

<sup>51</sup> 所見原件如此，當作 "they"。

<sup>52</sup> 所見原件如此，通常作 "Yenching"。

<sup>53</sup> 此詞形近 "worker"，且此處用法較特別，待考。

speak of Communism while the picture of Communism in China is quite different. He is and has always been a free man. He is a member of the People'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He moves about freely. Anyone could come to his house. He is not watched nor his house tapped.

3) He then explained the severance of his connection with the WCC. He had no business to be a President of the WCC, when he could not function effectively as a President. He said that it was a rule in the WCC that unless all the Presidents of the WCC agreed to a statement, no statement could be released by the WCC. He then spoke about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WCC Presidents. One year he was sent a statement and asked to sign it. It referred to "many Gods and Lords Many," also "to dark despair involving the world." He could not subscribe to such statements. Because of his protest, the message was slightly modified and issued. Next year he was sent a blank paper and was asked to sign it so that the annual message might include his signature as well. But he could not sign any such blank paper. Then came the Korean negotiations and the WCC resolution.

He thought over the whole thing very carefully, and without consulting anyone—not even his Bishop—he resigned the presidentship of the WCC. The Government came to know of his resignation only two months later.

4) He is now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Yench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He has given a big portion of his house to Yenching for its research library and studies. He began to study four years ago Russian, and he can now read Russian books on philosophy. He is interested now in drama and is an acknowledged critic of plays. His criticisms of drama are eagerly sought after, and published. He told me that he had more freedom now than ever before—religious or academic.

In talking with other friends like Rev. C.W. Lee I got the impression that "Dr. Chao is more a poet than a theologian, that he is very emotional and often unbalanced."

The one thought of Dr. T.C. Chao at present is to get back his son and daughter. Incidentally I learnt that Bishop Robin Chen also has a daughter of his in the States who is not allowed to return to China with her husband, though both are very eager to get back. He too appealed to me to secure the help of Christian friends in the States to enable his daughter and son-in-law to return to China. Both are doctors. Dr. T.C. Chao's son has a doctor's degree in geology.

## 附件四

May 22, 1956

Dr. Edward C.T. Chao  
1524 N. Ohio Street  
Arlington, Virginia

CONFIDENTIAL

Dear Dr. Chao:

Bishop Manikam of India has been in correspondence with some of us here on a confidential basi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your father, and we know of his desire to have you return home and of his recent letter to you. As one who lived in Paoting and Peking almost twenty years, and has known your father well for most of that time, I have been requested to do anything I can to help in this matter.

I am occasionally in Washington on other business and expect to be there some time about the middle of June. I wonder if it would be possible for me to see you at that time and talk with you? Our only desire is to be of assistance to you in any way that we can, and not to change your mind in any way. If you should wish to return, we would be glad to help in any way possible. If your decision is to remain here, I would not in any way attempt to change that.

If you feel there is any urgency about this matter, I would try to make a special trip, if that seems called for, or possibly ask some other friend to see you. I don't suppose you will be in this vicinity any time soon so that I could see you here. If you do not feel there is urgency, I would be very gla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calling upon you when I am in Washington next, and shall let you know the date when my plans are more certain so that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Dr. Manikam was your father's guest at his home during his recent visit to China. He reports that he is happy in his work as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Yen-ch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side of Peking, as you probably know), is now doing much reading in Russian, is much interested in drama and is known as a drama critic.

I shall hope to see you before too long. In the meanwhile, if there is any way in which we can be of assistance, please let me know.

Sincerely yours,  
Wallace C. Merwin

WCM: cfm  
B.C.: Dr. J.W. Decker

## 附件五

June 18, 1956

The Rt. Rev. R.B. Manikam  
Bishop of Tranquebar  
Tranquebar House  
Tiruchirappalli, S. I., India

CONFIDENTIAL

Dear Dr. Manikam:

Last Friday, June 15th, I was in Washington for other business, but had made arrangements to see Dr. Edward C.T. Chao, son of Dr. T.C. Chao, about whom we have had some correspondence. Dr. Chao and I took lunch together, and spent over an hour talking. He confirmed the information given me in an earlier letter, conveyed to you in my letter of June 4<sup>th</sup>. He has an excellent position, and will soon move up to research work, which pleases him very much. He owns his own home. Both he and his wife have taken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have no desire to return to China. He has written this clearly to his father, telling him that he did not write frequently the past few years for fear of making difficulties for his father. The letter he wrote to his father apparently was sent after your visit with him, however.

Dr. Edward Chao is strongly of the opinion that his father is urging his return to China because of pressure that is being put upon him. He says that his recent letters from his father have been carbon copies, and he thinks that this is strange unless the original must be submitted to someone else or it is a hint that they do not express his true feelings,<sup>54</sup> You are no doubt aware that there is a tremendous campaign going on to try to get refugees from Communist countries to return. Many of the Chinese in this country are receiving such letters, often from friends or relatives who would not ordinarily write to them.

I pointed out to him the fact that you were obviously convinced of the sincerity of his father in seeking his return, and what seemed to be a genuine misapprehension on the part of Dr. T. C. Chao of his son's real situation. We also discussed the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even the keenest minds of the whole Communist situation, and he agreed that his father might indeed believe that which he had reported to you of his son's situation and the situation in China. There is no question in the young man's mind, however, about his own future, which he believes to be in this country. As you

---

<sup>54</sup> 所見原件如此，這逗號應作句號。

no doubt know all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with scientific training leaving this country were removed about two years ago.

Incidentally, we have looked back into the records concerning Dr. T.C. Chao's own experience. We have on file the June 1952 edition of Hsieh Chin (協進), which was the organ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and then that of the "Three-Self Movement". Under the heading of "Church News" there is a dispatch from Yenching University stating:— "The Yenching School of Religion has officially dismissed T.C. Chao from his position as Dean. On March 17 Sheng Kung Hui Bishop Ling Hsien-yang announced that he had: 1. Suspended all of T.C. Chao's clerical privileges; 2. Dismissed him from all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North China Diocese; 3. Asked the House of Bishops to take away his clerical orders."<sup>55</sup>

This is simply reported for your information. It may be that Dr. Chao has forgotten the details of what happened at that time. In view of the official nature of Hsieh Chin, and the fact that the same news was carried in the secular Chinese press, as attested by Dr. Frank Price, who was in China at the time, there seems little doubt about the accuracy of the report.

I am unable to report anything further about Bishop Robin Ch'en's daughter at this time. The Episcopalian staff is out of town at a conference this week, and so far as I can ascertain have not yet received confirmation of the desire of Bishop Ch'en's daughter and her husband to remain in this country, as reported to you in my letter of June 4th.

With kindest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Wallace C. Merwin

WCM: cfm

C.C.: Dr. C.W. Ranson  
Dr. J.W. Decker  
Dr. W.A. Visser't Hooft

---

<sup>55</sup> 所見原件如此，此處當有引號完。

## 撮 要

本文作為對《建道學刊》前期所刊一篇文章的回應，側重討論了有關趙紫宸研究的七個關鍵問題，即：趙紫宸與吳耀宗的關係、協進會的淡出、趙紫宸與西教士的關係、趙紫宸研究中的史學原則、青年會與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糾結、趙紫宸辭去世界教會聯合會會長的始末，以及趙紫宸的悲劇性。本文作者認為，趙紫宸罹禍，固然是當時險惡政治環境中不可避免的結果，然而，他從此在自我作賤復作賤他人的「集體無意識」中得以有意地無為，今天看來也未始不是值得慶幸之事。本文以充分的史料為根據，以嚴謹的分析作先導，嘗試重新描繪本世紀中國這位傑出的基督教神學家在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鮮明生動的形象。

## ABSTRACT

As a response to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Jian Dao* issue 9,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seven central issues with regard to the study of T.C. Chao (1888-1979), the most distinguished theologian China has ever produced: namely, T.C. Chao vs. Y.T. Wu; the dysfunction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neutrality attested in the study of T.C. Chao; the 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the Young Wo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s interaction with the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T.C. Chao's withdrawal from the World Christian Council; and T.C. Chao as reflected in the tragedy of Chinese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In attempting to portray a true to life picture of T.C. Chao, the author provides some minute analyses and in-depth comments based on available historical evidences from various sourc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reflection on the presence of non-participation and its function, which was obviously adopted by T.C. Chao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uthor includes in the appendix fiv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which have so far remained unknown to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scholarship.